

国学经典文库

春秋左传

全本

—

陈戍国 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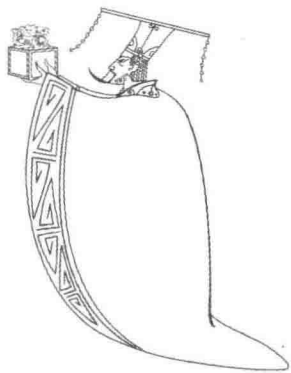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文库

春秋左传

全本

陈戍国 校注



岳麓書社 · 长沙

《四书五经》总序

中国古代近代的经学遭到严酷的空前的批判，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整整十年的大革文化命，更把对经学与孔子的批判推上了顶峰。早在五四运动前后若干年，经书经学被宣判为“古衣冠的僵尸”。大革文化命的年月，据说已将“孔老二”再次打倒，将经书经学定性为“封建文化的糟粕”。如果说五四运动前后“打倒孔家店”的宣传与对经学的清算为启发民智、解放思想所必需，只是那偏离理智的狂热终究在历史的检验面前难免令人遗憾；那么，后来大革文化（包括经书经学）命的浩劫，就未免让人觉得十分可笑而且可恶了。

2001年，距离五四运动已经八十余载，告别大革文化命的时代也已二十多年。这一年的8月15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的首篇《李学勤谈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如下的综述中华学术的议论赫然在目：

乾嘉学术的核心是在经学。实际上，整个中国学术的核心都是经学……说中国学术的核心在经学，是就其学术地位和影响而言。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学术的核心不是佛道，应该是儒学。儒学的中心就是经学。

大学者评价经学到如此高度，上世纪委实罕见，而新世纪此时始闻之。没有非凡的穿云破雾的洞察力，没有源于真知灼见的

巨大的学术勇气，谁敢说经学原本有如此重要的学术地位呢？凡是尊重历史、尊重学术的文化人，只要认真思索，都应该承认：中国经学史固然积弊不少，而经学本身终以精华为多。谁能说学勤先生言过其实了呢？难道中国古代史上曾有别的什么能够取代经学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吗？

从学勤先生的高论得到启发，我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林林总总思索有年，自觉大体上弄清楚了若干问题。已知前修时贤关于中国学术多有精辟之言。在反复证实了他们的种种见解之后，如果加以融会贯通的功夫，一以实事求是为上，那是可以就中国古代的学术（包括经学）与学术史（包括经学史）略述梗概或心得的。其要有七。

自东周到清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只能是经学，只能是解说、研究《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汉以后附加《论语》《孝经》与小学，宋以后加上《孟子》）的经学。没有别的什么学术盛行时间如此之长，包罗内容如此之广。如果不是这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独立性就会丧失殆尽。此其一。

昔司马迁论六经要指，充分表现了他熟谙六经的学识。“《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说六经各有所长，各有其显著的学术特色。联系后世通行的学科分类，《易》是讲哲学的，《礼》是讲行为实践，讲伦理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书》和《春秋》是讲历史是非的，《诗》和《乐》是讲文学乐、舞、艺术的。然而人为的划分界限并不完全符合各经所有的内容。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经学几乎没有不涉及

的。太史公说的只是各经的主要情况。他论六经与他的父亲论六家要指一样具有权威性。此其二。

中国古代人文社会科学当然有列于经学之外者，然而唯有经学才是当时学术的中心。诸经各有其主要分野，然而诸经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平列的呢？历来有《易》或《诗》为群经之首两说，经古文学家与今文学家各执其是。但是没有说《诗》为经之原或经之本的。倒是《汉书·艺文志》早就说过六经“《易》为之原”。鄙意：六经（后来《乐经》亡佚）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都很重要，可是六经之间并非平列关系，而与《汉志》不同的说法确已存在。至迟初唐以前就有学者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这话是南朝梁皇侃说的，而初唐孔颖达等人援引之，突出《礼》在六经中的地位，这个观点毕竟已见于小戴辑《礼记·经解》的孔疏了。后来吾湘经学家皮鹿门先生作《经学通论》，其中有一条目为“论六经之义《礼》为尤重，其所关系为尤切要”，此条正文一开头就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皮氏以为《礼记·经解》“首节泛言六经，其后乃专归重于礼”，正可以证明他的论点。换一个视角看：《礼》之外任何一经与他经的关系，都不如《礼》与他经关系之“切要”。我们相信：学术之贵，在于经世致用。质言之：任何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都不会重视对于当时的统治、当时的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帮助的所谓学术，而与统治阶级关系最密切的社会活动首先是保护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经济利益的政治，统治阶级此类意识形态才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牵涉政治与礼的关系。《礼记·哀公问》记孔子的话：“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者长于行，礼者政之本。礼的经世致用最为现实，最为直接。所以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礼制建设与礼学教育。属于经学的其他诸经本来就没有谁离得开礼，如皮鹿门所言：“皆有礼在其中。”

张惠言《虞氏易礼序》：“《易》者，礼象也。”《周易郑荀义·略例》说到“易三义”，又说：“其言爻象消息皆变易也，礼制经论乃不易也。”曹毅荪元弼先生《礼经学》：“《书》者，圣人以礼治天下之实政也。”王安石《答吴孝宗书》早就说过：“《诗》《礼》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更早就说过：“《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至于郑康成《六艺论》说的“善于礼”的《左氏春秋》，这里就不必说了。让我们再说到《周易》。《易·系辞上》“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根据是什么？“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那繁多的爻位之变，难道不是以礼制原则为根据吗？这里伴随着相关的疑问：六经“《易》为之原”的说法究竟该作何理解？难道《书》《诗》《礼》《乐》《春秋》之“原”都在于《易》吗？我们认为：《易》长于变，这个强调“变”的思想原理为六经所证实。礼也会变化，不能一成不变；总该变得适应社会的需要，才会有永恒的生命力。礼学也是如此。与五经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学术莫不如此，所以说“《易》为之原”。然而，由于诸经之撰作都在社会生活中无时或缺的礼仪礼典实行之后，包括《易经》在内的经书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当时社会“政之本”的礼制，所以说“总以礼为本”。^①此其三。

其四，应该说到经学与史、子、集部之学的关系。吾湘近代经学家王壬秋弟子为王氏编辑诗文集《王志》，其卷一论“子史不必读”，写道：“为学但当治经，读子史者失学之人也。”我们不敢附和此说。说“为学当治经”，不错；说“为学但当治

^① 拙撰《论六经总以礼为本》《经学札记三则》已畅论礼书礼制与其他经书的关系，请参看。

经”，加一“但”字，这就不对了。我们认为经、史、子、集之学都应该学，都应该治。一则史、子、集部之学自身重要，其内容与作用非经学所能取代；二则史、子、集部文献或者可以证明五经文字，或者可以证经学道理。

其五，应该说，作为儒学中心的经学不必排斥佛道二氏之学。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六：

永乐初，有献《道经》者。成祖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道经》何用？”斥去之。

朱棣认为儒学五经可以帮助他治理天下，而《道经》无用，帮不了什么忙。王伯申《经传释词》卷七解释文言语词“耳”，说：“犹‘而已’也。”从“五经耳”句可以推断，在永乐帝朱棣心目中，佛经也是没有用的。其实，佛道虽然不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但绝不是无用之物。就中国魏晋以后学术大厦而言，佛道二氏之学无疑也是支撑大厦的栋梁。（而中国道家道学的历史不会短于儒家儒学。）它们对于各相应历史时期的统治都是有用的，不知朱明太宗为何不肯承认二氏之学的价值、地位与功用。他的父皇和他的后嗣并非如此。

其六，《论语》《孟子》多记孔子、孟子的话，《大学》《中庸》相传分别为曾参、子思所作，已被历史证明其中大部分言论确有道理。既如此，将这四种文献视为经书可以说是对的。汉代学者与宋代学者先后将《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列入经学，表现了非常有远见的目光。然而必须指出：南宋以后兴起的“四书学”，固然是传统经学发展的重要产物，已经在经学史里占有重要位置，但它毕竟只是经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已。有人坚持“朱熹用四书学取代五经学”的观点，既背离史实，也不合道理。

还有其七。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有学者宣布了经学的

死亡。那么此后的“易学”研究、“尚书学”研究、“诗学”研究以及“礼学”研究算什么呢？刘起釭先生的《尚书学史》、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算不算经学研究呢？近年编辑出版的《经学今论》算什么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书局陆续整理出版了成系列的十三经清人注疏，有力地推动了经学的普及和经学研究的深入。在中国大陆举行的与经学研究有关的大型活动，最有影响的也许要算是2003年11月中旬的“清代经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上旬的“首届中国经学学术研讨会”，两个会议召开地点都在大陆的清华大学甲所。高度重视经学及其研究的李学勤先生是研讨会的主要主持人。为数不少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台湾学者1997年成立清代经学研究室，此前此后，在经学研究目录的编辑、经学典籍的标点整理、经学家研究资料与经学史研究诸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自2002年起，台湾的清代经学研究室诸君，由林庆彰先生率领，“推动晚清经学研究计画，采分年进行、从各地区入手之方式，以凸显各地区经学研究的特色”（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发行的专刊《中国文哲研究所》）。其计划之宏伟，方式之切实可行，值得击节称赏。诸君揭橥“经学研究”的大方案，如果认真实施，对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应该可以产生推动作用。看来经学已经复活，现在是生机勃勃。如果承认中国古代学术中经学的中心地位，为什么不能承认经学研究的继续呢？经学没有死，经学不会死。数十年来，经学研究实际上已经融入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以及语言文字学诸领域的研究了。中国古代经学既为中国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其他相应诸学科之源，又伴随诸学科的发展而获得新生或者繁衍，这和传说中的凤凰涅槃是不是有点相似呢？君不见中国

大陆的党政领导人，海峡彼岸有眼光的政治家，都在祖国传统经书经学中找到了共同语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我们有亲手点校的《四书集注》与《周礼·仪礼·礼记》白文本问世，90年代则有《四书五经》点校本出版。拙著《中国礼制史·元明清卷》脱稿于2001年年底。自2002年以来，我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四书五经》的校注工作与出版后的《四书五经校注》各册的修订工作中度过的，至今快五年了。若论读经书治经学的功夫，至迟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忝列郭君重晋稀先生门下做研究生算起，二十六年了。我们之于经书经学，“尽心焉耳矣”。而今年过耳顺，于经书经学竟不敢说已经无惑。这里敢说也不能不说的意思，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如下：愿意继续用功学习。但求与时俱进就好。期盼专家学者继续赐教是幸。

这里还应该交代的是：本套《四书五经》，是《四书五经》的校注本，以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相对应的部分为底本，参校本则另外注明。

是为校注本《四书五经》总序。

陈戍国 2006年5月4日深夜三时二十分

写于湖南大学友谊村之三楼

说明：

十五年前，我曾为《四书五经》写过一篇序，读者可以从岳麓书社1991年出版之后多次重印的白文本《四书五经》中看到。现在写的《总序》，就思想而言，自是十五年前那篇序的续篇。这里向那些给我写续篇的机会的朋友们致谢了。

陈戍国谨识

又过了十年半。感谢岳麓书社给予我重订此书的机会。

陈戍国 2016 年 11 月 19 日深夜

写于湖南大学友谊村之三楼

2017 年来了，我继续对国家规划办所赐课题 12AZD077 与 13&ZD058 的研究，又对《四书五经》做了一些补充。

陈戍国 2017 年 3 月谨识

《春秋左传》序

留心古代文献的学者，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都知道其中著录有“《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包括四库馆臣在内的不少学者知道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而所谓《左氏传》即后来学人称呼的《春秋左传》（简称《左传》或《左氏》）。《孟子·滕文公下》《史记·孔子世家》，还有别的好些古代文献，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至于《左氏传》，不少古人说是出自一位叫作左丘明的学者笔下，譬如《汉志》班氏自注就是这样说的。关于《春秋》与《左氏传》的作者，我们已经注意到早就有与上文所述不同的议论，但我们仍然相信上文所述大体上不假。孔子本不愿徒托空言以救世；然而他在汲汲道途求见用而不可得的情况下，据“鲁史”而修《春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杜预《春秋序》），“冀垂训于后昆”（孔颖达《春秋正义序》），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事。何况“鲁史”本来就有的，孔仲尼先生不过是对“鲁史”加工，把史料修订成《春秋》罢了。《左氏传》也不是天书，总该有它的撰写人与编辑者，他（他们）姓甚名谁，现在已经不太重要。

上文已言及学术界关于《春秋》与《左传》作者的说法有分歧，然而经学、史学研究者以及《春秋左传》的广大读者至少对于下面的客观事实抱有基本或完全一致的看法：一、《春秋》记

载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六年间（公元前 722—前 479 年）凡 244 年（也可以说是 243 年）周王室与各诸侯国的大事，主要是鲁国的历史，而鲁哀公十六年正好是孔子卒年。孔子不可能修订他身后的鲁史。二、《左传》所记史事，前期早于《春秋》，后期晚于《春秋》。前期姑不论，后期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止，比《春秋》多了十一年。实际上，鲁哀公二十七年以后的事，《左氏》也略有交代。书上写得明明白白，不应该也不容许产生异议。三、《春秋》与《左传》都是先秦儒家文献。四、《左传》的思想学术价值远在《春秋》之上。《春秋》很难说有明显的哲学思想体系，《左传》则相反。除了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我们还可以从《左传》找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许多方面的明确的表述，然而《春秋》则恐怕无从谈起。《春秋》质木无文，而“《左氏》艳而富”（范宁《春秋穀梁传序》），无疑称得上我国史传文学的杰作。

《汉书·艺文志》还告诉我们：《左氏传》之外，与《春秋》有关的书，已亡佚者居多数，而“《公羊传》十一卷”“《穀梁传》十一卷”见存。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都止于鲁哀公十四年，据说这是因为传者认为鲁哀公十四年有“西狩获麟”的事，孔子自叹“吾道穷矣”，所以传者不乐意写下去了。

经学史把《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左传》合而称之为“春秋三传”。《春秋公羊传》（以下简称为《公羊》，或简称为《公》）属今文经学。《左传》属古文经学。《春秋穀梁传》（以下简称为《穀梁》，或简称为《穀》）归于今文抑或古文，有异议，比较多的学者说是属于今文经。《汉志》春秋类著录有《春秋》“经十一卷”，论者说那就是公羊、穀梁两家《春秋》今文经。十一卷也就是十一篇。今文《春秋经》比《春秋古经》少一篇，有学者认为那是由于今文经“系闵公篇于庄公下”，因为

闵公在位年短，其事不足成篇。这当然不必是定论。

现在也许不大有人说《左传》是伪书了。不论今文经、古文经，只要都是指孔子修订的《春秋》，那就应该只有字体或书法的差别。经文原本一样，而传者传经，由于观点不同，见闻不同，传经之作也就肯定有了差异。经过汉代大学者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桓谭《新论》以及后来一些学者的辩论，特别是现代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的辩护，谓《左氏》不传《春秋》的说法恐怕也不能成立了。现在我们应该说：《左传》作者不但是《春秋》的传人，而且是《春秋》传人中最重要的功臣。桓谭说：“《左氏传》之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太平御览》卷六百十引《新论》）若无《左传》，不仅春秋时代当中有250余年的天下大事不可能比较清晰，而且春秋之前的史迹也会难于追踪。《公羊》《穀梁》两传合起来的篇幅也大大小于《左传》，其容量小于《左传》，毫无可疑。当然还可以说：《公羊传》《穀梁传》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自有其贡献，值得研究；但是《左传》在中国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哲学、文学、语言学诸方面的贡献，是《公羊传》《穀梁传》无法取代的。

我们这里还要特别说到《春秋》与《左传》对于中国古代礼学礼制的巨大贡献。为《春秋左传》作疏的唐初大学者孔冲远等人引前修或时贤说：“《春秋》者，礼也。”近代大学者王壬秋先生《代丰春秋例表序》：“《春秋》者，礼也。”苏厚庵《春秋繁露义证·楚庄王第一》：“《春秋》原于礼。”我们认为：前贤这一类论断都是对的。周公之后的大礼学家孔子修订的《春秋》，虽然没有写出“礼”字，而实际上自始至终都在宣扬礼制精神。《经典释文》引郑康成《六艺论》说：“左氏善于礼。”先秦周礼的原则精神、五礼大典及其演变，《左传》都有反映。《左传》是

先秦礼书的重要辅助读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左传》本身就是一部重要的礼书。^①不读《左传》,至少治春秋时代礼制者会感到一定程度上的缺陷。(当然,我们不是说有了《左传》,研究春秋礼制就什么都好办了。)

这里还应该说到《左传》与《周易》《尚书》《诗经》的密切关系。虽然不能说《左传》为其他数经之汇归,但是完全可以说《左传》一书有《易》,有《书》,有《诗》,更有《礼》。这是只要读过《左传》的人都明白的。

自古以来治《春秋左传》者不少。成就比较大而有著述传世的,首先是西晋的杜预(字元凯)。杜氏有《左传》癖,好《左传》而深思。他的《春秋经传集解》(以后简称杜注),代表了晋以前《春秋左传》研究的最高成就,称得上“春秋左传学”史上第一块里程碑。唐初,孔颖达等人撰作的《春秋左传正义》(以后简称孔疏),也还可以算是“左传学”史上的重要成果。唐陆淳著《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宋刘敞著《春秋权衡》、胡安国《春秋传》,元吴澄《春秋纂言》、赵汭《春秋集传》《春秋属辞》,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著《左传杜解补正》、王夫之著《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清学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毛奇龄著《春秋毛氏传》、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洪亮吉著《春秋左传诂》、刘文淇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王引之有《〈左传〉述闻》、俞曲园有《〈春秋左传〉平议》,也都是“春秋学”或“春秋左传学”的有代表性的成果。而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杨伯峻先生大著《春

① 毛奇龄《春秋毛氏传》卷十一:“谁谓《春秋》非礼书乎!”按:毛奇龄先生著述甚丰,他的怪论不少,但他说《春秋》是礼书,此论甚精。仿照此论,我们认为可以说:谁谓《左传》非礼书乎!

秋左传注》（以后简称杨注）修订本，则为“春秋左传学”的集大成之作，称得上该领域的第二块里程碑。^① 杨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凡例》写道：“《春秋》经、传，礼制最难。”“故此注释，以求真为本，于‘三礼’之说有取有舍。”可见他的大著已经在礼制研究方面下过大功夫。没有历代学者的智慧和辛勤，我们的阅读和研究肯定会碰到更多的困难。

我们的《春秋左传》，仍以阮刻本为底本，注意汲取前修时贤特别是杜注与杨注的研究成果，并贡献自己的一得之愚。我们的好些说法与前修时贤不同，这是因为我们自认为应该不同。《春秋左传》本来是儒家重视的经书中最大的一部，我们的校注不能不历时十九个月之久。感谢岳麓书社的朋友放宽了字数篇幅方面的限制。本书校注终于能够较多地放开手脚，校注者本人的话不算少了。

本来《春秋》是经，《左传》只是传，但是唐人《五经正义》之后，“春秋三传”都上升为经了。这里预先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本人点校《四书五经》而成白文本的办法，现在有了改善。本校注依春秋十二公之次序，以“经某年”“传某年”为标题，然后以“原文”标示《经》《传》的内容，以“注释”标示我们校注的内容。因为《经》文都很简短，除了隐公元年（《春秋》第一年）之首为《传》文（所记时事在本年之前发生），此下，包括隐公元年在内的任何一年的《经》文都在同年《传》文之前全部一次推出，不必划分层次。这样做，既于阮刻本原文无一字增删，又不致混淆《经》《传》，庶几乎于心可安。

^① 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讲得好的地方很多，可是错了的字句也很多，尚不足以享有“春秋学”里程碑之称誉。

有的《传》文较长，校注较多，我们将其划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段了，校注也相应地拆分开了，其校注的注码数字依次递升。这种拆分是出于阅读的方便，而非内容的差异。

我们注意到不少学者对于杜注、杨注以及其他相关著述的批评。以杜镇南将军终生钻研《春秋左传》的功力，以大学者杨伯峻先生的博学，尚且难免差错，何况浅学如我呢？先师郭君重晋稀先生在世时，多次谈到他和杨先生的交谊。而今郭、杨两先生都已仙逝，无由讨教，心何悵悵！好在可以向广大读者朋友、学界同道与健在的先生请教，是为至盼。

陈戍国 2004 年 3 月谨序于湖南大学，2005 年 8 月改订



岳麓書社

读名著 选岳麓

